

Title	中唐的「難易之爭」与中国文学語言革新的早期実験
Sub Title	The "easy-difficult" dispute in the middle tang and early experiments in Chinese language reform
Author	王, 涵(Wang, Han)
Publisher	慶應義塾大学藝文学会
Publication year	1990
Jtitle	藝文研究 (The geibun-kenkyu : journal of arts and letters). Vol.57, (1990. 3) ,p.77- 89
JaLC DOI	
Abstract	
Notes	
Genre	Journal Article
URL	<a href="https://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detail.php?koara_id=AN00072643-00570001-0077">https://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detail.php?koara_id=AN00072643-00570001-0077</a>

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KOARA)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コンテンツの著作権は、それぞれの著作者、学会または出版社/発行者に帰属し、その権利は著作権法によって保護されています。引用にあたっては、著作権法を遵守してご利用ください。

The copyrights of content available on the Keio Associated Repository of Academic resources (KOARA) belong to the respective authors, academic societies, or publishers/issuers, and these rights are protected by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When quoting the content, please follow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 中唐的「難易之爭」與中國文學語言革新的早期實驗

王 涵

一

三十年前，中國著名的隋唐文學史家周祖謨先生在其所著「隋唐五代文學史」中，曾指出存在於唐代貞元、元和時期的文學創作中的「難易之爭」。他說：

唐代散文發展到貞元、元和之間，在文壇上要求改革南北朝以來佔統治地位的駢文，已經成爲出身中小地主階層的知識分子的普遍要求。要改革駢文，必須要有新的文體來替代它。在當時，許多人都在這方面摸索着前進。摸索的道路主要有兩條，即是文章「宜易」呢？還是「宜難」？……而當時實際創作上，也的確存在着這兩條道路。白居易、元稹就是走「易」的路，樊宗師就是走「難」的路。這種「難易之爭」實際上意味着這批改革者對新的散文道路的摸索。而韓愈的重要功績就是解決了這一個問題並且以實踐證明了他的正確。

周先生以其治學的細膩和敏銳，準確地抓住了貞元、元和時期文學改革派內部的主要矛盾，也給與了我作進一步研究的啓示。我的考察雖然與周先生的考察不盡相合，但却是以周先生的考察爲起點的。

唐代的文章改革並不始於貞元、元和時期。在韓愈、柳宗元或白居易、元稹登上文壇之前，唐代文章改革的趨向即在內容上載道、及在體式上易駢入散，都已被大致上確定了。對於貞元、元和時期的文學改革派來說，他們除了要繼續擴大前人的戰果外，他們的視點，已經更多地注意到了文學語言的改革方面。這反映出當時的文學改革，已由肌膚深入到細胞組織上了。「難易之爭」也正是在這一文學改革由巨入細地向縱深發展的背景下發生的。

所謂「難易之爭」、爭論的並非是文體而是文學語言方面的問題，即文章用語的宜難宜易。李翱說：「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sup>(1)</sup>。孫樵說：「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sup>(2)</sup>。可見「難」、指的是文章語言的艱深怪異；「易」、指的是文章用語的通俗淺易。「攻於難者」所事弄的，是一種離開當時口語較遠的超語體文；而「習於易者」所致力的，則是在創立言文一致的語體文。

這是一場屬於文學改革派內部的、不具保守與非保守性質的爭論。它反映的是文學語言如何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問題。

誠如周先生所指出的、「易」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白居易、元稹。白居易、元稹在元和年間都擔任過諫官和知制誥之職、他們深感於當時宮廷文書的「雕章縷句」「淫辭麗藻」之「傷文」、使「補察之義廢矣」<sup>(3)</sup>、因而產生了「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sup>(4)</sup>的改革動機。他們始而以文入詩、寫作了大量明白如話、亦文亦詩的「諷諭詩」、以這種形式作為諫章來上達天聽；繼而又「芟繁詞、鏟弊句」<sup>(5)</sup>、「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sup>(6)</sup>。他們由於在語言上以「淺切」<sup>(7)</sup>為其創辟方向、採用了與當時口語比較一致的語體文進行寫作、讀者羣不僅涉及「王公、妾婦、牛童、馬走」<sup>(9)</sup>、甚至「老嫗都解」<sup>(9)</sup>。其一時之盛如「舊唐書」所說：「若品調律度、揚權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

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sup>(10)</sup>。「舊唐書」將元、白奉爲元和文壇宗主、可見以白居易、元稹爲代表的「易」派在當時的文壇及社會上的影響之大。

周先生指出了「難易之爭」的客觀存在以及白居易、元稹走的是「易」的創作路線、這無疑是令人信服的。但周先生對於「難」派以及韓愈的考察却是值得商榷的。我以爲韓愈並不是「難易之爭」之歧異的解決者、而恰恰是與樊宗師一路的、走「難」派的創作路線並使得「難」派的「怪奇」作風成爲當時古文派創作時尚的重要人物。「難易之爭」的問題在當時也沒有得到解決。

### 三

我們從韓愈對樊宗師的評價上、不難看出他們之間的文章同道關係。

其「與袁相公書」云：

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深刻、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

又其「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云：

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綜合韓愈對樊宗師的評價，可知要點大致有三，一曰：「善爲文章，詞句深刻，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二曰：「於辭於聲，天得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三曰：「文從字順各識職」。韓愈在贊許之餘，對樊之文字還發出了「有欲求之此其躅」的感慨。

根據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的記載，樊宗師著作頗豐，但「全唐文」僅存其「絳守居園池記」一篇。僅此一篇，亦使人讀之疲精竭力而猶惑，成爲中國文學史上千古難解的奇文。歐陽修曾爲之大傷腦筋道：「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於此」<sup>(11)</sup>；又嘆道：「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sup>(12)</sup>。歐陽修還多少給韓愈留點面子，在對樊文的評價上未和韓愈大唱反調，其他的評論者則就不那麼客氣了，梅聖俞乾脆說樊文是：「黑石鑄辭澀如棘，今昔往來人不識。酸晴欲抉無聲形，既不可問不可聽」<sup>(13)</sup>。劉壎亦曰：「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礎蔓磊塊，類不可讀」<sup>(14)</sup>。

樊宗師爲文，艱澀怪奇至宋人已無法卒讀，空餘「今昔往來人不識」之嘆，而韓愈却盛贊其「善爲文章，詞句深刻」，對樊之文字「有欲求之」但悵不能追步，韓愈倘不是與樊宗師有着共同的文學見解和文字好尚，是不會對樊如此推獎的。何況韓所許樊者，與韓所自許者，又何其相似，如出一轍。

韓愈還將兒子韓昶送至樊宗師門下學文，而韓昶一旦爲文，竟以其文中用字之難使樊宗師「讀不能通」而大奇<sup>(15)</sup>。看來在文字的求怪求難上，韓昶不僅頗有乃父及乃師之風，而且竟有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之勢了。

至少在語言創辟上，韓愈與樊宗師走的是相同的路子，都是在文字的艱深怪奇上下功夫的，由此形成了「難」派的主要語言特色。而要使語言艱深怪奇，根據口語造語是不成的，只有「窮荒搜幽」、師古、法古，甚至比古人還古。因此他們又很講求文和字的「識職」。所謂「識職」，只有林紆道出了其中真諦，他說：「文從字順，似人人能之，所難者識職。職

字是用字能得其出處、能使其安宅、用此字便稱此字之職。非深小學識古文者、何能至此。……昌黎用字有來歷、故能道出職字<sup>(16)</sup>。可見「識職」、就是講究用字要有來歷、要根據傳統語言造語。韓愈還說他「凡爲文辭、宜畧識字」、這箇「字」、指的就是古書中的文字。韓愈雖然標榜自己能「唯陳言之務去」、又稱贊樊宗師「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但這祇是爲了說明他們在語言創造上能够推陳出新、並不掩蓋他們根據傳統語言造語的事實。歐陽修已指出樊宗師的「絳守居園池記」、是模倣「尚書·盤庚」且又想文字上做得比「盤庚」更古奧。明方以智亦曾列舉韓文的衆多語例、來說明韓愈的造語方式。其「通雅」云：

如退之文、「苗薺髮櫛」、「目濡耳染」、「齟目詠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問見層出」、「曹誅五界」、「變索」、「噫暗」、他如「喞唳」、「癢疵」、「媼媼」、「窟竅」、此類甚多、皆對「廣韻」抄撮、而又顛倒用之、故意警牙、鹿門以爲生割、甚爲退之不取也。〔通雅〕卷八)

對古書抄撮其語、「而又顛倒用之、故意警牙」、韓愈的造語方式、由此可見一斑。這樣造語、除會帶來語言的古奧外、自然還會導致語言的怪奇。這就不難理解「難」派的文章用語、爲何會以艱深怪奇成其特色。此外、韓愈也與樊宗師一樣、在師古、法古的同時又想把文章做得比古人更加古奧。例如他對「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所載「子產不毀鄉校」一事的改寫。「左傳」的原文是：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韓愈在其「子產不毀鄉校頌」中、對上文的改寫是：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囂々。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昌黎文集卷二）

韓愈對「左傳」文字的改寫、固然是實現了他的「唯陳言之務去」的主張、未「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可他也把文字弄得比古人更難懂了。韓愈說他「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答李翱書》）、他的確是企圖把自己裝扮成古代「聖人」的代言人、以演出現代歷史的新場面的。

但韓愈與樊宗師不同的、在於他基本上能做到「文從字順」。他不像樊宗師那樣層疊奇辭怪語、並生搭硬配、以致佶屈聱牙、語病纍々。韓愈的文章雖也時有語病、但至少是流暢的、一氣貫注的、他的文章用語雖不通俗、但至少不是奧澀難解的、他既使在創辭造句時有意炫奇、也大致能遵循傳統的語法習慣。例如「曹成王碑」中的「嘖鋒蔡山、踏之。剡蕪之黃梅、大鞞長平、鑿廣濟、掀蕪春、撤蕪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趾泌川」；「進學解」中的「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櫛櫨侏儒、椳闔扂楔」；以及「鄆州谿堂詩序」中的「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捫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等々、都是基於「識職」「識字」原則並有意奧奇的語例、但它們祇是修辭上較怪而已、詞法和句法都是符合規範的、並不讓人覺得艱澀拙糲。所以宋吳師道曾論道：「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遊者、若李翱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苦。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怪奇澀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足以兼之。故月蝕詩効盧、銘樊墓用其體。若將約其橫驚、屬其殘斷、而矯其甚者。韓子之奇、奇之正也。二子之奇、奇之偏也。」<sup>(18)</sup>這是說韓愈詩有盧仝的特點、文有樊宗師的特點、但韓愈能「約其橫驚、屬其殘斷」、矯盧仝、樊宗師之弊、故其詩文能做到奇而不偏。吳師道的意見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中唐文壇的「難」派一路，並不是自韓愈、樊宗師才開其先河的，其肇端始自元結、蘇源明。歐陽修嘗云：「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sup>(20)</sup>胡應麟也說：「大概六代以還，文尚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爲古文。蕭、李尚平典，元獨矯峻艱澀，近於怪且迂矣。一變而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也。」<sup>(21)</sup>歐、胡所論，頗爲切當，是知樊宗師制文不僅承緒元結，而且把元結爲文之艱深怪奇發展得更加變本加厲。蘇源明是元結的同時代人，「其最稱者，元結、梁肅」，並嘗向唐肅宗舉薦過元結。<sup>(22)</sup>蘇源明爲文，「多作奇字，猝不易讀」，風格與元結相近。杜甫在「八哀詩」中對其「制作揚雄流，溟漲本末淺」，頗有微詞。但元結、蘇源明都是爲韓愈所推崇的。韓愈「送孟東野序」嘗云：「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以蘇源明、元結、李觀的文學成就與陳子昂、李白、杜甫相提而並論之，未免不太相稱，但倘若瞭解到蘇源明、元結之「所能」即其創作特點以及韓愈的好尚，就會知道韓愈對他們的推重並不是盲目的。更何況韓愈對他們的推重是着眼於其文辭能「及於古」的。正因爲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才會惺々相惜、格外推許。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提到的李觀，亦是以文辭的瑯琊艱深成其特色，在此方面能與韓愈相左右的韓派作家。韓愈「北極贈李觀」詩云：「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獨與夫子親」，<sup>(23)</sup>是知他們是交情篤厚的朋友。李觀屬文，辭勝於質，李翱「與陸修書」云：「予與觀，平生不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sup>(24)</sup>陸希聲亦謂「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sup>(25)</sup>對於陸希聲的這一評價，後人多不以爲然。但其實陸希聲只是就韓、李二人在文字的求難程度上置評的，他並不是認爲韓愈的文字功夫不如李觀好，只是認爲在文字的求奇事深上，韓



不及李罷了。這對於韓愈既不能說是貶語、對於李觀也不能說是褒語。在「難」派筆路藍縷的慘淡經營階段、李觀的貢獻、自是不能忽視的。

## 五

韓愈、樊宗師、李觀等「攻於難者」在文學語言上的刻意求深、使得這種求深傾向成了當時古文派作家競相效法的創作習尚。元和及其後期的古文派作家、除柳宗元、李翱外、幾乎無不走怪奇路線、並力倡文章語言的宜深宜奇。如皇甫湜「答李生第一書」云：

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奇。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鏗於烏鶻、言之華也。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全文卷六八五）

又其「答李生第二書」云：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也。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同前）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亦云：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奇走怪、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全文卷七九四）

又其「與友人論文書」云：

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

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同前）

皇甫湜、沈亞之、孫樵等韓門弟子還有晚唐古文派作家杜牧、劉蛻等人爲文的務求怪奇，已多爲論者所論。問題在於他們爲什麼這樣重視文字的怪奇，這樣起勁地求奇走險呢？皇甫湜、孫樵的解釋都是：文奇可以傳遠。皇甫湜還以爲「非常者」在當時必「不如常」，然後必「出常」而其傳必遠。這與韓愈的看法幾乎也是一樣的。韓愈「與馮宿論文書」嘗云：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々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竅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

又其「答劉正夫書」云：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必無後世之傳也。

韓愈在文字上的求深務奇，除了怕自己的文字有「剽賊」即襲古之嫌，因而要做得比古人更古外，顯然還是爲了創立與當時的「俗下文字」截然不同的一種文字風格。對於韓愈所說的「俗下文字」，後人多臆爲齊梁文字，其實謬也。我以爲韓愈所說的「俗下文字」，與當時的「用俗」之風有關。這股「用俗」之風，是由張籍、王建開其先聲的。胡震亨嘗云：「文章窮於用古，矯而用俗，如〈史〉〈漢〉後六朝史之入方言俗語是也。籍、建詩之用俗亦然。王荊公題籍集云：看是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凡俗言俗事入詩，較用古更難。知兩家詩體，大費鑄合在」。<sup>(29)</sup>張、王爲矯齊梁之餘弊而「用俗」，其創辟確是看似尋常，成却艱辛不易的。這股「用俗」之風又爲白居易、元稹發展而成盛勢，王安石謂「天下俚語被白樂天道盡」，<sup>(30)</sup>可見其「用俗」的層面之大。在當時文壇「美才輩出，孺豎道真，涵泳聖涯」，<sup>(31)</sup>使文風大變，齊梁文字幾

經掃蕩，已成強弩之末，不爲人喜的情況下，韓愈所自慙「時々應事」而作而「人以爲好」的「俗下文字」，並不可能是齊梁文字而只能是「用俗」一類。當時的用俗之風的影響之大，甚至使已退居一隅的駢文也出現了語言通俗化的傾向，韓愈受此風影響而作些「俗下文字」，也在所難免。何況韓愈又是個喜歡「以文爲戲」的人，這恐怕也是他的「以文爲戲」的行徑之一。韓愈爲自己的文字在當時尚無法與「俗下文字」匹敵是深感遺憾的，但他以爲「俗下文字」雖然能討好於當時，必不能流傳於後世；而他所刻意以求的「奇辭奧旨」即那些擬古文字，雖不能稱意於當時，然必能有後世之傳，收名之遠。所以他把自己的文字創辟比作揚雄之撰「太玄」，並引用揚雄的話說：「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

韓愈的預言也並未落空，因爲他生前因未能使「古文」大行於世而不盡稱意，身後却獲得了極高的殊榮。白居易、元稹在中唐雖有「賢不肖皆賞其文」之盛，但至宋代即不走紅。自從蘇東坡提出「元輕白俗」<sup>(32)</sup>之說後，附和者頗衆，而韓愈反倒成了「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一言而爲天下法」的文章宗師，香烟接續，不絕如縷。同是爲現實政治服務的載道文學，在當時及在後世的際遇竟如此不一，這對於我們這樣一種以「道」即現實政治爲脊里的，始終以載道主義爲正宗的文學來說，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起碼，在文學如何更好地爲現實政治服務的問題上，我們可以從古人的嘗試中得到此一啟示和借鑒。

但本文實在無意於討論文學如何爲政治服務的問題，祇想指出，中唐文壇上的「難易之爭」其所以值得注意，在於它可以視作是中國文學語言革新的早期實驗——像這種語體文與超語體文雙峯對峙的，語體文還一度較超語體文居於優勢而成爲文學語言的主流局面，在此前的中國文學語言的發展史上，還是從來有過的。

中唐的「難易之爭」還以前人未及的視點，注意到了文學語言的革新和發展，究竟應該怎樣進行的問題。白居易、元稹等「習於易者」，顯然是力求符合當時民衆所能接受的水准，盡量想使文學語言向當時的口語靠攏的。而韓愈等「工於難

者」、則是按照文人的教養程度、在文人熟悉的傳統語言的基礎上進行革新與創辟的。「易」派與「難」派各有其可以凭借的地勢、各有其產生的理由和存在的價值、比較其孰勝孰優或揚此抑彼是沒有意義的。

文學語言是構成文學作品的首要形式因素。而中國的漢字以其獨特性——有六義、有四聲、有其象形性、表意性、亦有其裝飾性、音樂性等々、這必然造成中國文學語言的多彩多姿。而作為文學語言的來源又是多方面的、中唐貞元、元和時期的文人們在中國文學語言革新的早期實驗中、主要在汲取口語及傳統語方面進行了嘗試、他們的嘗試對於中國文學語言的發展、是具有深遠影響的。當今的中國文壇、仍然處於文學語言革新的實驗階段、探討先驅者們在革新實踐中的優劣得失、對於今天的中國文學語言的革新和建設、將是不無意義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於東京蝸廬

〔注〕

- (1) 李翱「答朱載言書」〔李文公集〕卷六
- (2) 孫樵「與友人論文書」〔孫樵集〕卷二
- (3) 白居易「策林」六十八「議文章」〔白香山集〕卷四十八
- (4) 白居易「寄唐生」〔白香山詩集〕卷一
- (5) 見白居易「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制」〔白氏長慶集〕卷五十
- (6) 見「新唐書」卷一七四「元稹傳」
- (7)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云「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 (8) 見「白氏長慶集序」
- (9) 見宋惠洪「冷齋祖話」
- (10) 「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論」
- (11) 歐陽修「跋樊宗師絳守居園記」(「集古錄跋尾」卷九)
- (12) 歐陽修「絳守居園池」(「居士集」卷二)
- (13) 梅聖俞「寄題絳守園池」(「宛陵先生集」卷四十九)
- (14) 劉壎「隱居通義」卷十五
- (15) 見韓昶「自為墓誌銘並序」(「全唐文」卷七四一)
- (16)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
- (17) 韓愈「科斗書後記」(「韓昌黎文集」卷二)
- (18) 對此金人王若虛在「滄南遺老集」中曾多有指出。
- (19) 「全唐文記事」卷五十八引
- (20) 歐陽修「唐韋維善政論」(「集古錄跋尾」卷六)
- (21)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八「九流緒論中」
- (22) 「新唐書」卷二〇二「蘇源明傳」
- (23) 「新唐書」卷一四三「元結傳」
- (24) 「四庫簡明目錄」子部術數類
- (25) 「杜少陵詩集」卷十六
- (26) 「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一
- (27) 「李文公集」卷七
- (28) 陸希聲「李元賓集序」
- (29) 「唐音癸籤」卷七
- (30) 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引王安石語

(31) 見「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傳序」

(32) 見「蘇東坡集」卷三十五「祭柳子玉文」